

外国史学名著选

主 编 吴 于 廑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选

商 务 印 书 馆



K545.2
X694

963055

外国史学名著选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选

吳于廑譯



K0006679

+

商务印书馆

1980年·北京

本书供高等学校历史系学生使用。

外国史学名著选

吴于廑主编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选

吴于廑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2³/₄印张 57千字

1963年10月初版 1980年7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 2,300册

统一书号: 11017·186 定价: 0.32元

重 印 前 言

高等学校历史专业设有史学名著选读一课，其中包括外国史学名著选读。本书的编译，即为适应这一课程的需要，目的在使学生略知若干重要著作的内容，借以扩大学术眼界，为批判地接受外国史学遗产提供资料。

本书选译的西方史学名著有：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李维，《罗马史》；普鲁塔克，《传记集》；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米涅，《法国革命史》；梯叶里，《第三等级的形成及其发展史论》；普莱斯苟特，《墨西哥征服史》；格罗特，《希腊史》；朗克，《教皇史》等。每种名著约选译三至五万字，大体上首尾一贯，成一单元。选译部分或为书中著名章节，足以代表原书的特点；或为书中所述的某一重要方面，有利于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每种都有著者简介，扼要介绍著者生平、重要著述、史学观点以及学术影响等，也附带说明译者所据版本或其他文字译本。为便于学生阅读，译文中某些典故、制度、人物为一般教科书中所不常见者，酌加附注。附译旧注或原注繁冗为初学所不需因而删除者，亦由译者分别说明。

由于各书选译完成时间有先后，1962—1964年初版时，暂就已完成者先行分册付印。这次重印其中六册，由原译者作了修改，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郭圣铭、南京大学历史系张竹明参与校订。

吴于廑

1979年6月

目 次

修昔底德简介.....	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第七卷.....	19
译名对照表.....	79

修昔底德簡介

修昔底德生于公元前五世紀，其生平已不可詳考。現在流传的傳記共有三種：一種是公元五世紀馬塞林所作；一種不知作者姓氏，也不知成書的年代；還有一種作于公元十世紀，是蘇達斯所編辭書中的一個條目。三種傳記以馬塞林所作為最早，但是去修昔底德生時已近千年左右，除摭拾修昔底德書中所偶爾涉及的生平事迹而外，沒有多少確鑿可信的材料。在希臘古典作家中，修昔底德的同时代人很少提到他；只有公元前一世紀的戴奧尼修、公元一至二世紀的普魯塔克和鮑杉尼阿，留下一些片段的記載。

目前所有關於修昔底德生平的可靠記載，都出自他所著的《伯羅奔尼撒戰史》。他是雅典人^①，父名奧路斯^②。他在薩所斯島對岸的色雷斯沿海擁有金礦開採權，有聲于當地的上層社會^③。從伯羅奔尼撒戰爭一開始，他就留心搜集資料，準備寫一部戰史^④。公元前429年，雅典瘟疫流行，他受到傳染，幸免于死^⑤。五年以後，即公元前424年，他被選為雅典十將軍之一，指揮色雷斯一帶的軍事。其時斯巴達的將領伯拉西達正進攻安斐波里斯，他由薩所斯

① 《伯羅奔尼撒戰史》，I, i, 1; V, xxv, 1。以下援引《戰史》材料時，只列卷數和章節數，不注書名。

② IV, civ, 4.

③ IV, cv, 1.

④ I, i, 1.

⑤ II, xlviii, 3.

率战船七艘往援，败绩，退保厄昂^①。安斐波里斯之役以后，修昔底德蒙罪放逐，流居国外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他致力于写作《战史》，并从伯罗奔尼撒方面获得不少材料^②。战争结束后，他回到雅典^③。虽然《战史》只写到公元前411年，但书中有好些话说明他曾看到战争的全部过程：他明白提到战争绵延了二十七年，也提到雅典的长城和皮里犹斯港为斯巴达所占领^④。斯巴达的来山得尔进占雅典，在公元前404年4月，修昔底德显然曾亲自见到雅典海上霸权的崩溃。

修昔底德《战史》的特色之一在于叙述的冷静。安斐波里斯之役，是他一生荣辱所关的事件，但书中对他的失败和放逐，没有作任何辩解。在长达八卷的《战史》之中，有关他生平事迹的地方寥寥可数。除上文所述而外，其他方面就只有依靠后人零碎而又不尽可信的记载。有的记载说：修昔底德的父亲和色雷斯王同名，色雷斯王的女儿赫格西庇尔嫁给雅典的米提阿德，生客蒙；修昔底德的母亲和客蒙的母亲也同名；他的墓或衣冠墓又和客蒙一家的墓连在一起。因此有人推论，修昔底德和声名显赫的客蒙必有姻戚关系^⑤。这些事实如果可靠，当然有助于说明修昔底德家庭在雅典社会中的地位。但是提供这些资料的记载本身凌乱而矛盾，有些学者认为并不足信^⑥。据马塞林之说，修昔底德的放逐是由克里昂提议的，罪名是背叛雅典。从修昔底德和克里昂在政治上互相敌视以及战后他在雅典通过一项特许召回的专案后才能回国来看，这

① IV, civ, 5; cvi, 4.

② V, xxvi, 5.

③ I, xciii, 5.

④ V, xxvi, 1—2.

⑤ C. F. 斯密司译，《修昔底德》，罗叶布古典丛书本，第1卷，引言，viii.

⑥ G. B. 格伦底，《修昔底德及其时代的历史》，第1卷，第44页。

一說法似頗可信。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卒年代，現在也难确考。旧說据公元一世紀伊壁道魯斯的女作家彭斐拉所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修昔底德已经四十岁，因之他的生年应为公元前471年。但修昔底德在第五卷中自云“一生閱历了全部战争，正当明达之年”^①，語气不像在战争結束时已临衰迈之际，把他的生年定在公元前471年未免过早。按雅典的定例，年不滿三十，不能当选为將軍。修昔底德当选將軍在公元前424年，如他得志較早，其生年可能在公元前460年至455年之間。到公元前404年战争結束的时候，他大約已五十稍外，这和第五卷中自述的語气比較符合。看来他在战后沒有活多久，否則《战史》不致不能終稿。他对公元前396年以后的事情全未提及，但却提到死于公元前399年馬其頓王阿基劳斯的改革^②。从这点推想，他的卒年可能在公元前399年至396年之間。他大概活了五十五岁至六十多岁，一生中精力最旺、思慮最成熟的时期，都付之他那部不朽的著述^③。

虽然我們对修昔底德的生平所知不多，但是根据以上所云，已可看出他著书的重要背景。他出身于富有之家，在海外有重大的经济利益。他不能見容于克里昂，是激进派的政敌。在一个短时期內，他曾經身居要职，并直接指揮战争，因之熟悉国家的政治和軍事。又因曾遭放逐，他能够利用这个特殊的、不受敌方疑忌的身份，从伯罗奔尼撒方面获得有关的資料。他的一生正当雅典城邦盛极而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思潮，都必然对他有深刻的影响。

① V, xxvi, 5.

② II, C, 2.

③ G. B. 格伦底，《修昔底德及其时代的历史》，第1卷，第11—47頁，对修昔底德生平有詳細的叙述和分析。謝德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譯本（商务印书館1960年出版）譯者序言中“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一节，所述亦較詳，可參看。

二

公元前五世紀中叶是雅典伯里克利当政的全盛期。这时波斯帝国的势力已经退出爱琴海，雅典已经树立了无可爭辯的海上霸权，爱琴海的东西两岸已经是雅典宰制的天下。約当修昔底德出生后不久，即公元前454年，提洛同盟的金庫已经移到雅典，大小約二百以上的盟邦在事实上都已成为雅典的藩属。在此以前和以后，雅典又利用战胜波斯的形势，向爱琴海区以外扩张势力。尼罗河口、塞浦路斯島、黑海沿岸，都曾经是雅典海軍的揚威之所。这时雅典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已经越出小国寡民的、自給自足的古老城邦的范围。馬其頓、色雷斯、赫淪斯滂、黑海沿岸、小亚細亚沿岸及爱琴海的島屿、埃及以至远在地中海中部的西西利、意大利南岸和西岸，都一方面成为雅典的市場，一方面又以其粮食、土产、原料或奴隶供应雅典。在雅典控制下的提洛同盟，正是适应这一发展的政治形式。

然而正当雅典威力全盛的时期，城邦的经济和政治扩张已经导致不可解救的矛盾。提洛同盟虽亦可以号为海上帝国，但雅典对盟邦的控制极不巩固。希腊的城邦政治去集权帝国还有一段遙远的距离，仅仅是征貢区的划分、軍事移民的派遣、政治的干預，并不能使所有盟邦对雅典俯首听命。在雅典和它的盟邦之間，冲突不断发生；经济較发达的盟邦，更其是伺隙而动，要求摆脱雅典的控制。提洛同盟之外，雅典在扩张中还遇到强大的敌手。科林斯、麦加拉嫉視它的商业势力，斯巴达在政治上和它两不相容。在伯里克利当政之初，雅典和伯罗奔尼撒集团已经发生多次的战事，不能取胜。三十年和約的訂立，不过是暂时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間平分海陆的霸权，导致战争的矛盾并未解决。在雅典内部，因奴隶制

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日益加深的财富不均，也使城邦自由民之中的矛盾趋于激烈。当时左右城邦政权、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政治派别，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问题：或者是采取稳健的政策，对盟邦的压迫不为已甚，缓和它们对雅典的不满，外以抵制伯罗奔尼撒集团的进攻，保持已有的海上利益，内以安撫穷困的自由民，维护奴隶主的城邦统治；或者是加强对盟邦的控制，以武力迫使就范，同时进行更大范围的扩张，击败斯巴达、科林斯及其僕从諸邦，把国内不安分子导向对海外的冒险。伯里克利鉴于公元前460年至446年間雅典对外战争的不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时候，选择了大体上稳健的战略和政略。但自其罹疫而死，雅典就发生温和与激进、主和与主战之爭，所爭的实质都不外上述問題。失势已久的贵族，又图乘机复辟。修昔底德在伯里克利的全盛时期，度过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在《战史》的写作过程中，雅典奴隶主阶级围绕战争問題而展开的政治紛爭，正如火如荼。修昔底德的阶级出身，个人的海外利益，都不容他对这样的问题置身事外。《战史》成书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其时雅典的霸权已倒，修昔底德由海外获赦而归，目睹被斯巴达軍拆毀的頽垣敗壘，对于人事成敗之迹，城邦兴废之由，乃不得不寻思其原委。他在著书之中所思索的問題，正是几十年来雅典政治爭論的焦点。所以《伯罗奔尼撒战史》之作，和公元前五世紀后期雅典所面临的矛盾息息相关。作者对于时代的問題，并非抱着如后世西方史学所标榜的客观主义的态度；在他的冷靜叙述之中，貫串着他时代問題的見解。

修昔底德的时代也是雅典文化高涨和人才薈萃的时代。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薩哥拉(公元前約500—428)和德謨克里特(公元前約460—370)、詭辯学者普罗塔哥拉(公元前485—415?)和哥尔基亚(公元前483—376)、修詞学家安提丰(公元前約480—411)、唯心

主义者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悲剧家爱斯奇勒(公元前524/5—456)、索福克利(公元前495—406)和幼里披底(公元前480—406)、喜剧家阿里斯多芬(公元前约450—385?)、雕刻家斐迪亚(公元前约490—417?)、画家玻力诺特(知名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建筑家伊克提努(知名于公元前五世纪后半)以及医学家希波克拉特(约公元前五世纪中至四世纪初)等,有的略长于修昔底德,有的是他的同辈。“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公元前约484—约425)则比他早生约三十年;当他开始撰述《战史》的时候,这位前辈史家还没有去世。虽然这些人物和修昔底德之间的关系,现已无从深考^①,但是无可疑问,他们从各方面代表了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时代思潮,而这个时代思潮又孕育了修昔底德的史学。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和后叶,是雅典处于新旧思潮激荡的时期。传统的信仰日益动摇,新的学说、思想渗透到文化的各个方面。阿那克萨哥拉和德谟克利特继承米利都学派的唯物论,认为构成客观万物的,是无数不可再分的极微物质的不同组合;因此支配自然现象的不是传统中的各种神祇,而是存在于物质自身的规律。普罗塔哥拉虽然不像唯物论者重视对客观宇宙的探索,但他怀疑神的存在,认为“人是万物的衡量”。从他开始,关于人的问题成为诡辩学者注意的中心。他们虽不以“真理”和“智慧”为可求,但却以为人皆可以期于道义,理性可以使人成为善良的公民。苏格拉底和他的门徒所反复问难的,也不外于人世的问题。这种放限于现实的人生、和传统神明违离日远的思想,同样体现于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在三大悲剧家中,爱斯奇勒还以神为人间命运不可抗拒

^① 据周塞林、苏达斯等后世的记载,修昔底德尝从阿那克萨哥拉学哲学,从安提丰学修辞,在少年时期听过希罗多德对所著《历史》的朗誦,但这些说法都无同时代或较近的史料可证。

的支配者。到了索福克利，神和命运就只作为剧情变化的背景，悲剧的主要命题是人的高贵伟大的品质。幼里披底更进一步，他所全力描写的是现实人生个性和感情的冲击，神不过是在楔子和收场語中用以起某种程式作用的角色。至于喜剧家阿里斯多芬，则几乎全以反映城邦的政治社会为其创作内容，一切都从人的问题出发。在繪画和雕刻方面，尽管也有不少题材取之于宗教神話，但其所体现的毕竟是一种属于人的美，是当时自由民追求所謂完美人格的反映。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奴隶主中的新兴富有阶层，正需要这种对人的意志和力量的宣揚，一面和不合时宜的传统进行斗争，一面开創和巩固有利于他們的新的城邦秩序。

希罗多德的《历史》同样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管他穿插了多少灵异的故事，在书中出现了多少次的神、多少次无稽的梦兆，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掩盖他对历史的自然和人本观点。他在叙述各国的制度人文之中，总不忘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风土气候以及动植物生态。对于希腊人在波斯战争中的胜利，他絲毫沒有运用神秘的解释；从他书中的最后三卷，可以清楚看出这是希腊装备精良、紀律严整、行动敏捷、领导有方以及处于防御优势的结果。在他的心目中，希腊历史上这次有重大影响的胜利，并非得天祐，而是出于人为。希罗多德在这一方面为希腊史学奠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修昔底德的《战史》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理解这个背景，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史学思想。近代批評家有人責备修昔底德，說他忽視思想文化的发展，对同时代人的文化成就几无只字道及。这个批評看来似是而实非。修昔底德所写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专史，他在第一章中就开宗明义，說明著史的目的，在于記述“一次伟大的战争”，而非記述一个历史的时代。如果以近

代通史的概念，衡量古代人所写的专史，那就未免苛求于題外。修昔底德虽然沒有論及他所处时代的文化思潮，但他却从中受到难以估計的影响。

三

修昔底德对于人世生活的看法，不同于旧的传统。旧传统把人世的种种归之于无可如何的命运，以为各式各样的神祇都在支配着人的活动，而人自身对于现实存在是无力的。修昔底德的看法不是这样。他的《战史》在某些地方反映了当时的宗教观念和人对于超自然的迷信^①，但全书的叙述从未出現灵祥灾异，从未出現神对于人間事变的干預。修昔底德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犹之自米利都学派以来朴素唯物論者对于宇宙的看法：宇宙万象决定于內在的規律，历史变化則决定于其自身的因果必然。阿那克薩哥拉和德謨克利特致力于客觀世界規律的探索，修昔底德則致力于历史因果的探索，人事規律的探索。他在《战史》第一卷中，从二十三节到一百四十六节，以很大的篇幅，論述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矛盾，并且指出矛盾何以爆发，从而闡明导致战争的远因和近因。这种重視事物自身联系的思想，也貫串于对个别战役的叙述之中。第六、七两卷記西西利之役，为全书叙事最精采的部分。修昔底德以极为生动的記事之文，透过种种事实，說明雅典致敗之由。讀完这两卷，誰都可以看出雅典远征西西利之所以全軍复沒，是因为外线作战的困难、海陆封鎖的无效、地形的不利、統帅的优柔、因国内受敌而造成的兵力分散、内部党爭对軍事的不利影响以及叙拉古方面不断获得有生力量等等，其中无一处可以归之于偶

^① 例如：VII, lxxii, 2—4; I, 4.

然，无一处可以归之于茫不可知的超自然因素。在西方史学中，以近似唯理主义的精神对待历史，应当說始于修昔底德。

正因修昔底德对待历史的态度是接近唯理主义的、求真的，所以他非常重视证据，重视证据的批判。他說：“关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实，既不据偶有的傳聞，亦不断以己見。不論是亲历或由他人轉告之事，都須尽最大可能，对每一細節作精审的研究，然后落笔；我把这点引为己任。”^① 他还指出辨訂真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目击同样事件的人并不作出同样的报告，或作左右袒，或則据其記憶之所及。”^② 修昔底德有見及此，乃于长时期的著述过程中，从不同方面搜集材料，既有来自本国的，也有来自敌方的。对于若干重要战役的经过，除其亲历者外，还可能作过实地的考察。第七卷所記西西利之战，大概就是经过实地考察才写定的。否則在沒有詳細地图可資参考的时代，他对山丘、岩谷、河流、沼澤、港口、关隘以及这些地形、地势在軍事行动上的意义，就不可能叙述得如此准确，如此具体。固然，修昔底德史学的謹严，也并非彻底的。《战史》中記載了很多的演詞，根据他自己的說明，不論是亲耳听到的，或从其他来源获得的，都不是实录。他說这些演詞的原文已经不能准确地回忆，只能就其概略，揆度演讲者面临当时情景所要說明的問題，約以己意，撰为演詞，一若是出于原来的讲者之口^③。这种方法当然不符合謹严史学的要求；不过修昔底德这样做，一面力求切近原意，一面也还认为演詞的内容，不能不决定于讲者的身份和所处的背景。就这点而論，他仍然是不忘批判的态度，仍然相信人物的活动不是漫无因果規律的現象。

① I, xxii, 2.

② I, xxii, 3.

③ I, xxii, 1.

修昔底德在史學上的求真，不是無所為而為的。他不是近代的所謂客觀主義者，不是為史學而史學。前文說過，作為雅典奴隸主階級的上層人物，他對公元前五世紀後半雅典城邦所遭遇的問題，不能無動于衷。他之所以著作《戰史》，完全是為而發。他和時代的思潮一致，所注意的正是人世中的現實問題。儘管為了保持敘述的冷靜，他在全書中刻意經營，但是這並不能掩蓋他著作《戰史》的實用目的。關於這點，修昔底德曾有所自白。他說他的書中沒有稗史野談，不足娛人，但人性是有常的，過去發生的事，將來也會在類似的情況下重複發生；如有要求鑒往知來的人，以他的書為可貴，則他就于願已足了。因之他又說，他的書“並非為要譽于一時而作，而是為了垂鑒于永久。”^①

修昔底德所說的“永久”，其實是指希臘奴隸制城邦時代的“永久”；他不可能、也不希望預見到城邦制的滅亡。雅典戰敗之後，修昔底德心中盤旋不去的問題，是如何從失敗中獲得有益于奴隸主統治者的教訓，如何糾正內外政策的錯誤，保持雅典強盛于不墜。對於戰爭期間雅典奴隸主的黨派紛爭，他並非超然獨處。他有自己的是非和褒貶，散見于若干章節之中，雖然敘事力求客觀，但用心仍不可掩。特別是那些由他重撰的演詞，在不少地方都是假他人之口，若隱若現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見解。在當時，雅典的主要問題對外是海上霸權，對內是公民民主。除了少數寡頭貴族而外，從一般富有的奴隸主和自由公民而論，問題不在于要不要霸權，要不要民主，而是在于用什麼方式保持霸權，實行什麼限度的民主。在這兩個問題上，形成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分水嶺。修昔底德以其特有的冷靜的史筆，寓褒貶于敘事。只要細讀全書，就不難看出他所

① I, xxii, 4

主张的雅典长治久安之策究竟何在。

本身拥有海外利益的修昔底德，无疑是雅典业已形成的海上霸权的支持者。但是他深虑树敌过众，不赞成对盟邦采取高压政策。公元前467(或466?)年，那克索斯脱离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这时雅典尚未取得幼里米屯河口的胜利，波斯仍然拥有重入爱琴海的潜力。对那克索斯的脱盟用武力弹压，从提洛同盟的利益说，雅典本可振振有词。然而修昔底德避不采用这样的论点，他说雅典“违反成规”，使那克索斯成为“第一个受奴役的盟邦”；接着又说，“自此以后，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别的盟邦也受到了奴役。”^①修昔底德在这里虽然没有对那克索斯事件下任何按语，但在寥寥不到数行的叙事之中，已经提出对雅典高压政策的谴责。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密提林事件的辩论。密提林于公元前427年背盟，雅典在压服之后，以是否执行处死米提林全部成年男子的议决案在公民大会中进行辩论。修昔底德书中以克里昂为一方，以戴奥都特为另一方，为之各撰演词，陈述激进派和温和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对立观点^②。他同样对事件的本身不置一词，但从他所重写的双方演词之中，已可看出激进派克里昂是如何赤裸裸地崇尚强权，蔑弃理性，以残酷镇压盟邦为得策；而戴奥都特又如何诉之于听众的理智，从雅典霸权的长远利益着眼，指出使盟邦不再背叛的方法“不在临以刑威，而在周密的管治。”^③因之这两篇演词的内容，已经尽了抑扬之能事；修昔底德不须另加断语，已经为双方的是非作了定讞。

为了同样的理由，修昔底德也不赞成雅典海权的进一步扩张，反对激进派的对外冒险政策。他托科林斯使者之口，在对雅典公

① I, xcvi, 4.

② III, xxxvii—xlvi.

③ III, xli, 4.

民大会的演詞中說，“不要侵犯力量与自己同等的国家，这比惑于眼前之事，冒险以求一得者，其地位坚固是更为可靠的。”^①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后，伯里克利采取稳重的、以防卫为主的战略，修昔底德对这点颇为称道。他說伯里克利“在平时执行温和的政策，致城邦于安全，雅典在他的治下达到强大的顶点；及至战争开始以后，他又对雅典的实力作了有远见的估计。”^② 修昔底德还把伯里克利的战略和他死后雅典当政者的战略作对比，指责后者违反伯里克利的方针，从野心和贪欲出发，采取危害国家利益的政策。他对西西利远征表示不满，认为是伯里克利后继者的重大失算^③。对于主战派的激进领袖克里昂和希帕布鲁，他都深加譏貶^④。对于温和派的尼西亚，虽然在西西利丧师辱国，却寄予极大的同情^⑤。这些都可说明修昔底德在如何保持雅典已有霸权问题上主张采取什么样的路线。

和他的对外主张相一致，修昔底德在对内方面同样要求遵循温和民主派的政策。他心目中最敬佩的政治家是伯里克利，而伯里克利正是改变厄非阿尔特激进民主路线的温和派领袖。他以优美的文笔，写下伯里克利在国葬典礼上的演詞，用以美化伯里克利的民主理想。实际上，修昔底德对雅典公民群众可说是无信心的，他不相信普通公民有政治判断的能力。当他叙述尼西亚在西西利处境险恶并在退兵问题上迟疑不决的时候，就以描写尼西亚内心活动的手法，衬托雅典公民不辨是非，有附和任何政客煽动的“习

① I ,xlii, 4.

② II ,lxv, 5.

③ II ,lxv, 11.

④ IV ,xxviii, 5 ; VIII ,lxxiii, 3.

⑤ VII ,lxxxvi, 5.